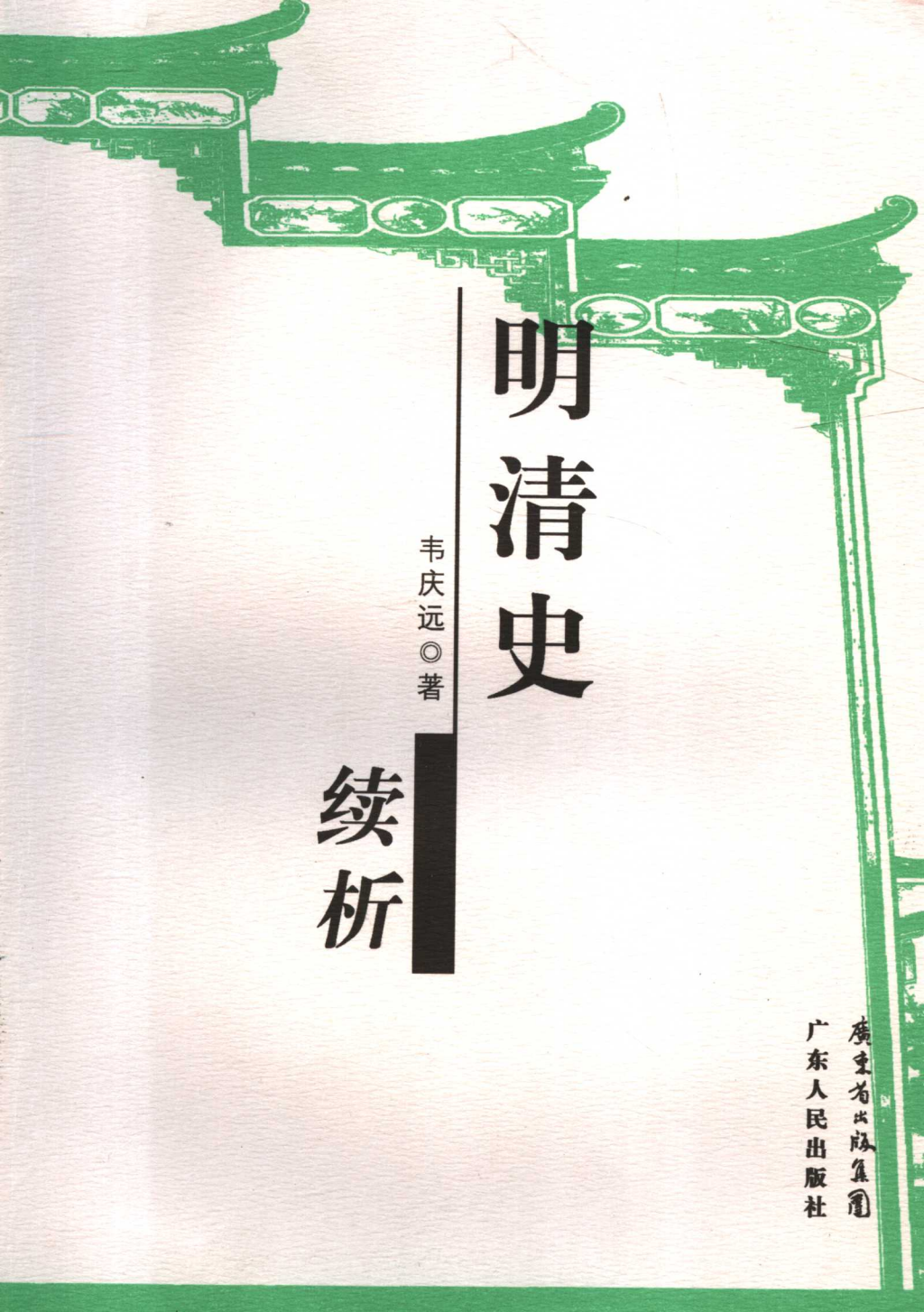




明清史

韦庆远◎著

续析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明清史

韦庆远
◎ 著

续析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史续析/韦庆远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9

ISBN 7-218-05365-3

I. 明… II. 韦… III. 明清时代—文集

IV. K296.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0278 号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责任技编
出版发行

赵殿红
吴德灏
黎碧霞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厂址: 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 38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25

插 页

1

字 数

345 千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5365-3/K · 1068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99710 (直销) 83790667 83780104 (分销)】



目 录

前言	(1)
明朝皇帝的“御驾亲征”	(6)
试论李东阳	(20)
“百粤行将遍，三春思转穷” ——论潘季驯巡按广东的政绩	(50)
论徐阶与严嵩的关系和斗争	(66)
有关张居正研究的若干问题 ——拙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的绪言	(80)
张居正与《历代帝鉴图说》	(109)
综述规章嬗变，析论政事风云 ——对张显清、林金树等著《明代政治史》的读后感	(118)
明中叶从抑商到恤商、惠商的政策转变	(123)
嘉靖时期商业的兴衰	(139)
祸由笔墨生 ——明清文字狱	(163)
明清时期的“非礼逢迎”和“反非礼逢迎”	(277)
明清时期的善人、善事和善书 ——为游子安著《善与人同》一书写的序言	(283)
试论雍正	(287)



《庄头家谱》与清代对旗地的管理	(310)
清代内务府的多方面功能	(339)
清代内务府的匠役和御用手工业	(359)
从澳门历史发展放眼国内外风云	
——为《澳门史新编》写的总序	(379)
清代徽州和珠三角经济发展的同异	
——为叶显恩著《徽州与粤海论稿》写的序言	
.....	(392)
试论陈垣教授对明清历史档案事业的贡献	(399)
附录:	
汉唐皇权与道家方士	
——阅读陈垣教授编纂《道家金石略》的札记	
.....	(411)
师凿书室记事	(441)
韦庆远教授主要著作目录	(450)
后记	(452)



前言

《明清史续析》是从本人近年写作的部分论文中选辑而成的。

明清两代为期五百多年（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共543年）。这五百多年的历史发展是极不平常的。它波澜壮阔迂回，苍黄翻复，屡有兴衰交替，又是从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的转折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其实，出现在中国近现代的重大变动，是早在明代中叶以后，特别是在清代前期便已多见端倪。研究明代和清代前期的历史，有助于对中国近现代的问题加深理解。

本集着重对中国封建君主集权专制发展到最高峰时期的政治局势进行观察；对封建社会后期作为国家首脑的若干位皇帝的人品素质、执政特点和采取过的重大政策措施进行检核；对位居统治集团高层的一些重臣们，由于学术理念分途、政策歧异和权位利害冲突因而引发的政争，对明清两代专制统治发展到高峰形成的大量文字狱案体，对其在当时起过的作用和影响进行评估。除此之外，也兼论明代的宦官政治，清代带有民族特征又关系国家大政的宫廷管理制度、旗地管理制度、御用手工业与科技和国防的密切关系；此一时期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和窘境；意识形态方面具有转型期特征新因素的萌发和被压抑，历史发展与国内外政局的联系，等等。笔者试图从这些侧面探讨明清时期与此前朝代的异同，从两个王朝的兴亡判断中国历



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实，早在明代中叶开始，自称为“天朝”的中国已逐渐陷入国际关系的漩涡之中。长期以来，地处南海之滨的澳门半岛便成为东西海洋贸易的主要中转港和文化沟通的交汇点，在东西两个世界间起到接驳、碰撞和缓冲的特殊作用。一些重大的中外关系和中国内政问题往往都与澳门有关，有时竟成为聚焦之处。澳门以弹丸之地却处在风紧浪急的国际关系连锁之中，成为矛盾丛集的中心，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中国人了解外国、走向世界的一个中途岛。由此决定了澳门史的研究势必成为明清史，特别是清史和近代史的重要分支。研究中国明清史和近代的海外贸易、文化交流、关税、外交、鸦片输入与“苦力劳工”输出，殖民地侵略和反侵略斗争等重大问题，澳门都独具特殊地位和无可代替的特别作用。有鉴于此，笔者近年将对澳门史的探索作为深入研究明清史的基石之一，作为自己的重点工作之一，有关澳门史的文章实际上也是明清史研究的组成部分。最早的考虑，是将这两方面的文章合编为一本书，取名为《明清史续析与澳门史研究》，其后经过澳门基金会吴志良先生和广东人民出版社赵殿红先生的提点，认为应该考虑到不同读者的不同要求，不如分拆为两书，即《澳门史论稿》和《明清史续析》。笔者欣然接受了他们的高见。《澳门史论稿》不久前已经出版，她是本书的姊妹篇。

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是明清史的重要内容。在本集中，笔者对明清时期一些关系历史进程、具有典型意义的政治人物作了评估，其中涉及明代的洪武、永乐、正统、正德和嘉靖、隆庆、万历诸帝和清代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帝，以及徐阶、严嵩、李东阳、潘季驯、张居正、高拱、杨一清、年羹尧、隆科多等人物。对其中有些人做了较全面的评价，但对另外一些人则只专论其某一突出的事件和方面。其实，有史以来，社会一切发

展变化都是离不开一定人物活动的。历史学基本上是人学，主要就是记载和评述历史上人物、人性、人际、人生的学问。明清时期的历史波谲云诡，屡次出现重大变化，社会开始转型，新生和腐朽的形态并存，处于方生未死，拼争极端复杂尖锐的时刻，此正为许多人物提供出充分发挥才能胆识，体现学养素质，并检验各自执持的政策纲领和学术主张的舞台，为当时和后代留下了极其丰富、可进行反复评估的宝贵资料。这些人物或是纵横捭阖、烜赫一时，或是失意败落、有志难酬，或是罪恶昭彰、身名俱裂。但亦必应注意到，确有一些人的是非功罪未有定评，长期聚讼，有待于史学工作者赓续努力，再深入探索。当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方面，是非和功过往往又是互为渗透和消长，古人说“理未易察，道未易明”，似乎还可以再补充一句：“人未易知”。论世知人，无枉无纵，力求做到公平公正，历来是史学工作者难以回避的难点。在本集中，笔者不揣浅陋，对久已存在严重争议的人物，诸如李东阳、张居正、高拱和雍正帝等数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思虑不一定严密，论据也不一定充足，不过是就目前的认识抒发己见，抛砖引玉，旨在向师友们请教而已。

在本集中，有两篇文章的情况需要略加说明：

第一篇是《祸由笔墨生——明清文字狱》。

这篇文章本来是应台湾某杂志社的邀约而写作成的。事在上世纪80年代末，该杂志社准备约请大陆地区的作者为撰稿人，在台湾出版一套普及性的有关中国历史的丛书，为此事与笔者联系约稿。笔者认为这对于沟通两岸文化交流，共同探讨祖国民族遗产都是有益的事，因此欣然承诺，并约定为之写作《祸由笔墨生——明清文字狱》一稿，签订了《图书出版协议书》，并且早在1990年就交了稿。按照《协议书》的规定，该社应于收到稿件后半年之内出书，如逾期不出书，就应对作者



作出赔偿。但遗憾的是，一拖十多年，未见以该社名义出书，亦从未与作者有任何交代。而在 2003 年却发现在台北由另一出版社将此稿印成单行本公开发行。不论在出版前抑或出版之后，又从未与作者联系，亦未支付任何稿费。为此事，笔者经与该社在大陆的代表人联系，答复说：“该社违约长期未出书，又不与作者联系，有关《协议书》已成废约，作者可以自行出版。”据此，笔者考虑到，批判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凶狠酷烈、毒害非常的文字狱，不论在学术上抑或实际认知上，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简要记述了明清两代有关史事，可能还有一些用处。为此，便决定将此稿收载在本集之内。

另一篇文章就是附录在本集的《汉唐皇权与道家方士——阅读陈垣教授编纂〈道家金石略〉的札记》。

为什么要将这篇文章附录在《明清史续析》之内呢？

这篇文章是本集作为另一篇文章《试论陈垣教授对明清历史档案事业的贡献》的续篇，两篇文章都旨在对陈垣教授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对不同类型历史档案一贯重视和辛勤整理的业绩，作必要的阐述。

陈垣教授早在 1929 年就明确指出：“档案，简单点说，便是未成书册的史料。”^①而这些未成书册的史料，既包括历代公私制作的纸质文书，也包括铸刻在金属和石碑上的文件。对于史学研究来说，都是最为珍贵的原始资料。正如陈垣教授裔孙陈智超教授所言：“重视碑刻资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又说：“《道家金石略》是一部大型的道教碑刻资料集，是垣老研究道教史的一项重要准备，也是一项重要成果。”^②

大力做好搜集、考证和整理以档案为主的资料工作，以作

①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 337 页，《中国史料的整理，档案的整理》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② 陈智超：《道家金石略》校补前言，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

为研究工作的必要准备和前提，是陈垣教授治学精粹之一。他不论对汉唐以来的道家碑刻，还是对明清历史档案，都充分体现着这样的精神和投入了锲而不舍的努力。两种档案虽然在用材和形成时期有所不同，但对它们的整理原则和方法，史料价值的评估标准和在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在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等方面都是密切相通的。《道家金石略》作为一部大型的专题资料书，不但对从事从汉唐到明朝宗教史、社会史研究的学者是必读之书，而且也是明清历史档案工作者和明清史研究者不可漠视的参考读物，触类旁通，必能从借鉴中吸取到丰富的学术营养，获取到宝贵的教益，正是从这样角度考虑。才决定将这篇文章列为本集的附录。

以上，是当《明清史续析》即将出版之际，笔者要说的一些话。

韦庆远

2004年冬日于广州师啻书室



明朝皇帝的“御驾亲征”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皇帝亲自领兵、御驾亲征次数最多的朝代，总计有四位皇帝、为数十一次的御驾亲征。这十一次亲征中，有的是为了安边定国，解除边患的威胁；有的是为了巩固政权，动用军力；有的则只是由于好大喜功，劳师动众，虚张声势；还有借此以炫耀武功，演出过一出又一出的荒唐闹剧。本文对此十一次的御驾亲征，就起因、战略部署、成败得失和影响等问题逐一检讨。

有明一代十六个皇帝中，曾身临战阵“御驾亲征”的，计有四人。按序为第三代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第五代的明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第六代的明英宗正统皇帝朱祁镇，第十代的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

这四个人处在明代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在个人气质、禀性、经历以及军事政治才能和见识胆略上也迥然有异。故此，他们的“御驾亲征”，在动因、过程和效果诸方面，也是完全不同的。对于这四个皇帝前后十一次“御驾亲征”，实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回顾。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出生在元末至正二十年（1360年）。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群雄纷起、逐



鹿中原的时期。在他出生的时候，恰好是决定着他父亲朱元璋政治命运关键的一年。当朱元璋从一个红巾军小校逐步升为大将、吴国公、吴王，以至登基为帝的过程，亦即朱棣儿童时期逐步成长的过程。他是在战争硝烟的笼罩下，以及在父亲胜利的进军步伐中度过自己童年的。

明王朝的建立，给朱棣带来了身份地位的巨变，在洪武三年（1370年），他年方十一岁，即被册封为燕王，指定藩府在北平（今北京）。此地位于幽冀要冲，与蒙古和辽锦接壤，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的雄关重镇；燕赵又多悲歌慷慨之士，一向盛出精兵良将。更由于当时元顺帝虽然被迫率部北遁，但仍僭号北元，在其麾下尚保有数量可观而且具有实战经验的铁骑悍兵，执戈控弦之士以十万计，企图依靠这些兵力与明朝对抗。因而不时南下寻衅，侵扰边地，并声言志在复辟。

朱元璋一直认为这是对新王朝最大的威胁，一再派使招抚，又屡次敕命大将常遇春、徐达、冯胜等率军备边接战，企图扫荡漠北，消灭蒙元残余势力。但敌骑倏忽往来，踪迹莫测，时和时战，反复无常。朱元璋在有生之年，仍未能达到绥靖北边的目的，临终犹引以为大憾。他将包括朱棣在内的诸子，分封在沿边要塞，称号为燕、辽、韩、齐、宁、谷、晋等藩王（以后被称为塞王），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边防，稳定局势。他经常以此晓谕诸子，教导他们提高忧患意识，并理解父皇的心愿。

朱棣自小即好钻研兵书武经，好议论行军布阵，讲究攻防韬略。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当他十一岁时，即奉敕率领护卫军五千七百余人就藩于北平。自此之后，他便逐渐承担起捍卫边疆、征讨不臣的重任。朱棣防边北伐，屡建战功，深得朱元璋的激赏，除了赏赐钞物嘉勉外，还一再扩大他的指挥权限。

可见朱棣虽然贵为皇子，但在青年时期，一直是过着沐风栉雨的戎马生涯，长期在军旅中接受战争的锤炼。他久经战阵，



善于运筹帷幄，出奇制胜，屡摧强敌，是公认的帅才。再看他在为谋取皇位，与其侄建文帝朱允炆相持四年的战争，即所谓“靖难”之役中，也是一再亲临前线，身冒矢石，及时制定战略、指挥战役，又能逢胜不骄，遇败不馁，终于胜利地进入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永乐。

只有在即位称帝以后，朱棣的亲身征战，才能称为“御驾亲征”。朱棣的“御驾亲征”，基本上是他身居藩王时防边北伐的延伸，也是朱元璋大力解除塞北边患既定政策的延续。朱棣从永乐元年（1403年）登位，至二十二年（1424年）去世期间，一共进行了五次“御驾亲征”。五次亲征的讨伐对象都是活动于辽东、漠北和漠西的蒙古势力。他们遁回故地，虽然已无法重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但仍有力量不时入塞侵扰，肆意抢掠人口牲畜财物，屠戮军民，掳杀明朝的使臣，甚至声言要卷土重来，收复大都（北京）。凡此，都造成了对明王朝北部、西北部的重大威胁。朱元璋穷半生之力，多次派遣徐达、李文忠、汤和、冯胜、傅友德等率领大军征讨，辅以招抚，迫切希望消解此一危害，虽然取到一些一时性的战果，但并未取得彻底的胜利。朱棣在父皇执政时历履戎行，深切理解“肃清沙漠”的战略意义，故在他登位后，便坚决执行大力解除北边忧患的方针。

从永乐元年至六年，由于要着重整顿“靖难”之后的朝廷政务，加以大战乱刚告结束，国家财政匮乏，社会民生殷望休养生息。是以在此期间，朱棣对蒙古曾使用招抚的办法，以取得边境地区的缓和，希望“边城万里烽埃无警”，“彼此永远相安于无事”。他企图利用蒙古族内部鞑靼、兀良哈和瓦剌三大部之间的互相攻杀，争取当时较为弱小的瓦剌部接受通贡敦睦，对其倾向内附的首领一再颁赐封号、授予官爵、赏给敕书金钞，企图使用分化的办法以削弱蒙古的整体力量。即使对于最桀骜



强悍、内犯最凶暴的鞑靼部首领，朱棣也屡次派使致书，表达“修睦通好”的善意。

但积六年之久，鞑靼不但拒不回书，甚至诛杀了明朝的使臣郭骥，且突袭防边明军，攻占卫所。朱棣忍无可忍，乃在永乐七年八月，任命淇国公丘福为主将，率军十万进剿。但由于丘福轻躁少谋，在前敌讯息未明，而又与后继明军失去联络的情况下，恃匹夫之勇，卤莽进击，因而陷入鞑靼的伏击圈内，导致全军覆没。朱棣惊闻败讯，深知非痛创鞑靼，实无法谋得边境的安宁，乃决定“御驾亲征”。

第一次“御驾亲征”是在永乐八年二月出师的。朱棣在出发前誓师告众，说明“荡除有罪，扫清沙漠”的必要和申述必胜的信心。他亲率六师，统领着五十万大军出塞，先行抢渡胘胸河，然后以急行军直扑鞑靼首领本雅失里屯兵所在的斡难河畔，发动猛烈突击。本雅失里大败，尽弃辎重牲畜，仅领七骑逃窜。此役重创了鞑靼主力，并迫使其内部分裂，鞑靼另一支阿鲁台部在势穷力弱之时，亲来明营表示归附。到七月，宣布胜利班师。

第二次“御驾亲征”是在永乐十二年三月开始进军。这是由于，随着鞑靼部的削弱，瓦剌部的势力却急剧地膨胀起来。瓦剌顺宁王马哈木攻杀了本雅失里，又吞占了阿鲁台原辖的领地，甚至威胁明朝，要求将在甘肃、宁夏原附鞑靼的各部转为瓦剌所属，一直到强扣明朝的使臣作为人质，严重危害明朝西北方边境的安全。面对以上情势，朱棣认为已难避一战，于是决定再次出师。

此次随征部队亦有五十万，他还携带着皇太孙朱瞻基同行，有意让瞻基经历战阵，增长才识。六月初七，大军在忽兰忽失温地方与瓦剌主力接战，朱棣亲披甲胄，率领铁骑出击，又以神机铳炮猛轰敌阵。但瓦剌部亦顽强应战，造成明军很大的伤



亡，甚至皇太孙也一度陷入敌阵，几乎被俘。此次战事胜负互见，只能说打了一个平手。瓦刺的元气固然受挫，但明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朱棣知道不宜恋战，乃于七月间颁诏回师。

自此之后的七八年间，明朝与瓦刺之间两军相峙，保持着一种戒备状况的平衡。但从永乐十九年起，原先降顺的阿鲁台因声势渐大，一再南下攻入明境的兴和、万和一带，杀害明都指挥使王唤，掳劫边境人畜。朱棣接到边关急报，乃决定出兵征讨，进行第三次“御驾亲征”。

当时明朝内部却存在着很不利的情势，因为刚完成了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为营建北京宫殿城郭以及长途运输，再加以派遣郑和等五下西洋，国家财政支绌。且东南倭寇之患渐起，唐赛儿等又集众造反于山东浦台，加以朱棣年事渐高，故此群臣多主张暂缓出师，谏阻皇帝再事远征。

朱棣拒不听纳，仍敕谕于永乐二十年三月出征。为了远途追击的需要，故除战斗兵员以外，又组建成军用驴马三十四万匹、车十七万七千余辆、民夫二十三万余人的辎重运粮队伍以为接应。七月，大军进至呼伦湖阿鲁台的主要据点，本期待一举歼灭其主力，詎料阿鲁台已作了战术转移，尽弃辎重马畜等，全部北遁避战。明军求战不得而粮秣已尽，加以经过百日行军而人马疲惫，伤病日多，实在已无法再事穷追，朱棣只好下令班师。此役消耗巨大，可说无功而返。

朱棣对于这一次远征未达到预期目的，一直耿耿于怀，他是一个执著于事功、坚毅好胜而不肯服输的人。因此在回师休整以后不久，便决定再次出发，矢言必求制胜以竟前功。故此，在二十一年七月，又率领大军踏上征途，是即第四次“御驾亲征”。

他沿着旧路前进，广置斥堠，远派侦察，务求寻到阿鲁台主力而痛击之，但阿鲁台仍然采取疾走远遁以消耗明军战斗力



的方式。朱棣大军搜索荒原，始终未见敌踪，在沙漠风雪严寒即将到来之际，只好黯然退军。

诂料朱棣刚回到北京，前方又传来阿鲁台乘明军回师，采取敌退我进的战术，挥军突袭明朝重镇大同和开平，蓄意进行挑衅。朱棣于是又决定再一次率军北伐，于二十二年三月，诏谕大军启行。这是第五次“御驾亲征”。当时朱棣已届六十五岁高龄，且刚在回师数月，兼在重病之后，本不宜再出。但他不甘于一连两次徒劳无功，更不能忍受阿鲁台降叛无常，且以虚虚实实的战术耍弄明军，更担心边陲自此不宁，于是再一次力排众议，强撑病体以励戎行。

大军出开平，过应昌，六月中旬进达答兰纳木儿河，本以为必能遇战，不意阿鲁台又事先隐遁，周遭三百里内不见一骑，明军实际上又是扑了一个空。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为阿鲁台提供了灵活出没的环境。阿鲁台的用意是藉此以疲明师，并伺机对明军发动突击。事实上，明军因出塞已久而无法遇战，势难久耐，朱棣只好下令回师。

更可悲的是，朱棣在返回途中病情加重，只能卧躺在舆辇上随军南回。七月十八日，竟然在榆木川军中去世。他是一个忧勤国事、不辞劳瘁，半生置身军旅，一意以安谧边疆为念的君王。他死于“御驾亲征”途中，可说是赍志以歿。

朱元璋绥靖北疆未竟之志，朱棣也未能实现，这并不是偶然的。朱元璋和朱棣两代英武之君虽然有志犁庭扫穴，耀武漠北，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蒙古族虽败归故地，但活跃在本民族地区，仍然是一支未可轻视的军事政治力量。相反的，裹粮远征朔漠的明军，却是一支行动较迟缓、讯息较闭塞、水土不宜的客军。两相比较，蒙古族确实占有相对的优势和方便。这样的形势，决定了朱元璋父子难以依恃军力得竟全功。终明一代，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北虏”问题一直困扰着明朝君民，正说明



问题的严重性。朱棣亲率六军，御驾前驱，披坚执锐，甚至丧命在征途上。虽然壮志未酬，但仍可说不失英雄本色，是值得历史上大书一笔的。

二

明朝第五代皇帝宣宗朱瞻基，在登基不久的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便率师亲征藩居在乐安，公然叛乱的汉王朱高煦。

朱高煦是明成祖朱棣的次子，亦即朱瞻基父亲明仁宗朱高炽的弟弟，朱瞻基的二叔父。朱高煦作为叔父而有志篡夺皇位，促使侄儿“御驾亲征”以讨伐叔父，其实是由于朱高炽、朱瞻基父子，与朱高煦之间长达二十余年为争立而结成的对立和仇恨。

朱棣嫡出的儿子共有三人，即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这三个儿子各有特点：高炽个性内向，温和宽厚，反应比较迟钝，不善领会父皇意图，亦不擅长迎合，而且体型臃肿，患有肥胖病，因此不为朱棣所宠爱。而高煦则迥异于乃兄，为人轻捷矫健，英武果断，长于骑射，具有很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朱棣发动长达四年的“靖难”战争中，他率军奋战，屡建奇功，曾多次身入重围，抢救朱棣出险。但此人性格狂傲暴虐，极其自负且有权位野心，根本看不起高炽的怯懦文弱。朱棣很欣赏他的悍武勇敢，甚至曾在酣战之余，轻许过由他继位嗣统。故此，在朱棣称帝之后，朱高煦认为论功行赏，自己必应被立为储君。他藐视传统的宗法原则，崇拜并有意模仿唐太宗李世民杀兄夺位的行为，经常以当代的李世民自居。第三子高燧亦一度有过争立之心，但他刚有动作，便被朱棣识破，予以严斥，因此言行比较收敛，转而结好于高煦，企图从支持